平实中的余韵

杨 焄

王运熙先生早年专注于研治六朝乐府诗，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因为要接替罹患癌症的刘大杰先生继续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“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”一段内容，其研究领域才开始逐渐拓展。然而受到时代风会的影响，魏晋南北朝文学此刻正日渐成为严厉批判甚至近乎全盘否弃的对象。正如同处一校的朱东润先生在晚年回忆里所说的那样，这段文学史在当时的课堂上往往遭到刻意的贬斥，“有时拖在先秦两汉后面，成为无足轻重的尾巴；有时搁在唐宋前面，成为视同弁髦的废物”（《〈魏晋南北朝文学史〉读后感》，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2年第3期；后收入《朱东润文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）。就在这样一种让人动辄得咎、噤若寒蝉的氛围中，王先生却能够不趋时风，坚持独立思考，撰写了不少旨在厘清史实、匡正讹谬的论文，虽然立论平实，却饶有余韵，值得细细寻绎。

魏晋南北朝文学尽管已饱受诟病，但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生活在晋宋之际，以躬耕自资而显得特立独行的陶渊明，免不了令人颇费踌躇。《光明日报》的《文学遗产》副刊围绕这一议题，组织发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激烈讨论，仅从1958年12月至1960年3月期间，就相继收到二百五十一篇来稿，约计一百二十四万余字。编辑部从中精心遴选出二十六篇代表性论文，又附录发表在其他刊物上的三篇文章，最终汇编为《陶渊明讨论集》（中华书局1961年），集中展现了陶学研究的最新成果。可惜统观全书，绝大部分作者都热衷于探讨诸如陶渊明到底算不算“现实主义诗人”、弃官归隐究竟是积极反抗还是消极逃避这样的问题，为此兴致勃勃而无暇旁顾。以至于编者在该书《前言》中不得不特意指出，其实还有不少重要问题未及深入研讨，“例如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究竟占有何等地位；他在文学发展上所起的作用；陶诗的艺术风格”等等。

王运熙先生显然有感于此，当即撰写了一篇《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风的关系》（载1961年5月7日《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》，后收入《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）。全文撇开阶级出身、政治立场、思想成分之类当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，着重辨析陶诗的语言风貌及其形成背景。其实这方面的研究并非无人问津，王先生在文中就列举出三种，包括高等教育部审定颁布的《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》、余冠英编注的《汉魏六朝诗选》以及谭丕模撰著的《中国文学史纲》。三者性质各异却又殊途同归，都认定“陶诗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歌崇尚骈俪和辞藻的风气相对立，表现出独创性”。这三家著述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代表性：《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》“除供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编写的依据外，并在教科书出版前供各校讲述中国文学史的参考”（见该书《说明书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）；余冠英先生长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汉魏六朝诗歌，《汉魏六朝诗选》凝聚了不少授课心得，而且在选录时也多有侧重，“东晋的重点是陶渊明的诗”（见该书《前言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）；谭丕模先生“先后在北平师范学校、民国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桂林师院、湖南大学、北京师大教授中国文学史”，教学经历格外丰富，《中国文学史纲》即根据多年来的讲义不断修订而成（见该书《后记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）。对于刚开始讲授文学史课程的王先生而言，《教学大纲》固然必须遵奉依循，余、谭两家意见也足资采摭借鉴。不过在他看来，这些著述中的评论并不符合事实。他钩稽排比了钟嵘《诗品》、沈约《宋书》、萧子显《南齐书》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、檀道鸾《续晋阳秋》等文献记载，证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值玄言诗盛行之际，而玄言诗并不追求文辞绮靡。所谓“崇尚骈俪和辞藻的风气”其实要迟至年辈稍晚的谢灵运等人登上诗坛以后才逐渐兴起，陶渊明怎么可能未卜先知地去抵抗尚未出现的创作风气呢？各家率然判定“陶诗语言特色与当时形式主义诗风对立”，混淆了先后时序，显然是无的放矢之举。

王先生在文中还进一步梳理了陶诗与玄言诗之间的离合异同，反复提到“陶诗的语言风格，还是在玄言诗流行的环境中形成的”，“对于当时流行的玄言诗，陶诗是受到它的影响的”，可知即便是对同时代盛行的玄言诗，陶渊明其实也绝无对抗立异的自觉意识。玄言诗因为喜好谈论哲理，以至“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”（钟嵘《诗品》），“遒丽之辞，无闻焉耳”（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），历代以来本就多受苛责，在当时更成为六朝文学腐朽没落的重要罪证。在《陶渊明讨论集》里收录了一篇署名为“复旦大学中文系56级陶渊明专题小组”（盛宗健、王崧、姚国华执笔）的《谈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——与刘大杰先生商榷》，开篇便气势汹汹地指摘刘先生所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由于“从主观的兴趣和偏见出发”，导致“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”，为此尤其强调：“当时的文坛上，充斥着逃避现实的‘玄言诗’，和骈词俪句的形式主义作品，而陶渊明以清新自然的诗句，歌颂了农村淳朴的生活。这是带有革命精神的。”矛头所指虽是刘先生，可接替其教席的王先生，在课堂上需要面对的也正是这批年轻学子。不难想见其文中针对陶诗濡染玄风所作的评议看似寻常，然而要公开主张，实在需要莫大的勇气。

王先生在文中逐一商榷的诸位学者——除了余冠英和谭丕模两位以外，还有参与起草《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》的游国恩、刘大杰、冯沅君、王瑶等先生——都是成名已久且术有专攻的名家，在陶渊明生平及创作方面也多有研讨，如游国恩撰作的《陶潜年纪辨疑》（载《国学月报汇刊》第一期，1928年，收入《游国恩学术论文集》，中华书局1989年）、王瑶编注的《陶渊明集》（作家出版社1956年），都不乏深湛精彩的意见。但在评述陶诗风貌时，或许是受到若干教条观念滋扰的缘故，以致各家都难免存有先入为主的偏见，未能平心静气地检核文献，最终得出背离事实的结论，这是令人深感意外和惋惜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王运熙先生和余冠英先生的交流其实还颇为密切。据他在《回忆与余冠英先生的交往》（载《文史知识》2000年第5期，后收入《王运熙文集》第五卷《望海楼笔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）中追忆，此前他就曾致信余先生，指出其《乐府诗选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）和《〈乐府诗集〉作家姓氏考异》（收入《汉魏六朝诗论丛》，棠棣出版社1952年）中的个别舛讹；当他将刚完稿的《说黄门鼓吹乐》一文寄呈请益时，余先生主动推荐其发表在1954年5月10日的《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》上；而他稍后结集的第一部书稿《六朝乐府与民歌》（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），也同样通过余先生的大力举荐得以迅速出版；为了集中精力做专题研究，他一度计划调动到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工作，依然得到过余先生的热情支持和悉心帮助。尽管如此，王先生对余先生笔下的疏失还是直言不讳，毫无徇私回护之意，并且显然也预料到余先生对此必然虚怀若谷而不以为忤，从中也足以窥见老辈学人在学术面前实事求是、平等相待的卓然风范。

写于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，二月八日，是运熙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

雨——苏州园林（国画）刘 赦
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公众号

园林里的真山与假山

顾 农

中国园林中安排假山大约比较的晚。早期的园林乃是皇家园林，占地甚广，其中有真山真水，再加上若干行宫楼阁，平时作为禁区封闭保护起来，不准老百姓进来砍柴、打鱼、捕猎，以便让皇帝及其身边的人得空时到这里来打猎、休憩、享受。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描写园林的名篇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被选进《昭明文选》时，归在“畋猎”一类，由此不难了解这种园囿的主要价值。这里根本用不着什么小家子气的假山。

后来私家园林兴起，其中不可能容纳真山，于是只好安排假山来过把瘾。《西京杂记》（卷三）有记载道：“茂陵富人袁汉广，藏鏹巨万，家僮八九百人。于北邙山下筑园，东西四里，南北五里，激流水注其内。构石为山，高十余丈，连延数里。养白鹦鹉、紫鸳鸯、牦牛、青兕、奇兽怪禽，委积其间。积沙为洲屿，激水为波潮，其中致江鸥海鹤，孕雏产鷇，延漫林池。奇树异草，靡不具植。屋皆徘徊连属，重阁修廊，行之，移晷不能遍也。汉广后有罪诛，没入为官园，鸟兽草木，皆移植上林苑中。”富豪袁老板的那些奇异的鸟兽草木，全部移入皇家园林，那座体量很大的假山难以搬走，只好留在原处，而这里也已被罚没归公了。

早期私家园林里的假山比较出名的有北魏时代洛阳城东张宅里的“景阳山”。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二“正始寺”条说起洛阳城东敬义里的正始寺，然后附带地记载了“敬义里南有昭德里，里内有尚书仆射游肇、御史中尉李彪、七兵尚书崔休、幽州刺史常景、司农张伦等五宅”。其中的张家宅第最为阔气，“斋宇光丽，服玩精奇，车马出入，逾于邦君”。司农是管经济的，张伦老爷大约近水楼台地为自己弄了不少钱吧。张宅最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在其中造了一座称为景阳山的大型假山，“园林山池之美，诸王莫及”云。

当时有一位作家姜质专门为张氏豪宅内的这座假山写了一篇《庭山赋》，《洛阳伽蓝记》曾大段引用，成为今天了解中古时代私家园林的大好材料。可惜此赋有不少字句不大容易理解，原因之一可能是流传过程中文字产生了讹误，其次则因为姜质用词鄙俗，一旦时过境迁，读者就不大弄得懂。姜质其人史书无传，《北史》卷四六《成淹传》顺便提到他一下：“（成）淹子霄，字景鸾，好为文咏，坦率多鄙俗，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，诗赋间起，知音之士所共嗤笑。”凡是“鄙俗”的词语，当时容易遭到嗤笑，年代一久则变得难懂，在工具书里也不容易查到。

《洛阳伽蓝记》在引用姜质《庭山赋》之前有一段小引式的文字，略云：“（张）伦造景阳山，有若自然。其中重岩复岭，嵚崟相属；深溪洞壑，逦迤连接。高林巨树，足使日月亏蔽；悬葛垂萝，能令风烟出入。崎岖石路，似壅而通；峥嵘涧道，盘纡复直。是以山情野兴之士，游以忘归。”由此可知景阳山与宅院中的建筑物距离很近，而体量甚大，风景极佳，引人入胜，其中的树木花草、珍禽异鸟，皆多有可观者。

早期的园林大抵以皇家园囿为典范，于是其中假山也总是以大为美，这同明清以后讲究小巧精致，审美的取向很不同。晚期的皇家园林仍然讲究真山真水，如承德避暑山庄，这里仍有相当可观的真山；同时也注意向江南小巧秀丽的私家园林取法，避暑山庄与颐和园的某些局部很像是苏州扬州一带的园林——小大由之，这是讲究两手都硬、尽善尽美啊。

凡是美的东西，总是会被追捧，被模仿。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

新疆味道

让石榴醒来

王 族

我在新疆第一次吃石榴，是在喀喇昆仑山下的叶城，同时也是第一次见到维吾尔族姑娘。

当时，我因为不了解石榴，在她问我是要吃甜石榴还是酸石榴时，便不知该如何选择。她笑着说，如果你的嘴是不怕酸的厉害嘴，就甜的酸的都吃；如果你的嘴不是厉害嘴，就只吃甜的不要碰酸的。

我小心行事，买了两个甜石榴。维吾尔族姑娘一看我掰开石榴就准备吃，便忙不迭地拦住我说，你如果这样吃石榴，就站到别的地方去吃，要是站在我的摊位跟前吃，你就要学会吃石榴的基本方法。我表示愿意请教，她轻轻把石榴掰开，好像要让石榴籽见到阳光，被风吹一吹，然后才可以吃。她看了看石榴籽的饱满程度和颜色，从神情上可断定她对那个石榴很满意。少顷，她把石榴递给我说，吃石榴要先让石榴醒来，然后才会又甜又脆。

我手捧着那个石榴想让它再醒一会儿，维吾尔族姑娘一皱眉头说，已经醒得可以了，它都用双眼在寻找你的嘴和牙齿，你难道还像没有嘴和牙齿的人一样慢腾腾的吗？噢，那就赶快吃吧。我看了一眼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石榴籽，然后抠下一把放进嘴里，一咬便有浓烈的甜汁冒出，口腔舌头便犹如浸入了蜜糖。那可真是甜啊，我用极快的速度吃完两个石榴，那位维吾尔族姑娘看着我的样子，眼睛里露出怪嗔的神情。我吃得高兴，全然不顾她的反应，头脑一热居然又买了一个酸石榴。

较之于甜石榴，酸石榴的皮更厚一些，籽也不如甜石榴那么紧密。我疑惑，这便是它们发酸的原因吗？那个酸石榴并不怎么酸，我尝了第一把石榴籽后便胆子大起来，当着那位维吾尔族姑娘的面将其吃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对她一笑。我为什么对她笑，是因为她长得漂亮，还是我吃完了一个酸石榴便自我感觉良好？当时我没想明白，现在亦说不清楚。但我至今记得她很漂亮，眼睛又大又黑，眉毛又弯又长，是一位美女。

我当时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大概她见我笑了便热情起来，笑着对我说，你的嘴是厉害嘴，不是你怕什么，而是甜的酸的石榴都怕你。我被感动，很想夸奖她漂亮，但犹豫了一下没有说出口。为掩饰我的紧张，我问她，这么好吃的石榴是哪里产的？

她又笑了一下，但很快便用惊愕的神情把微笑压了下去，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，有站在家门口问路的人吗？我仍不解，她便佯装生气地说，这些石榴呀，结出它们的石榴树现在就在不远的地方看着你呢，你说你刚才吃的石榴是哪里产的？经她一番仔细介绍，我才知道那么好吃的石榴是叶城产的，我在无意间走到了“石榴之乡”。我一激动便对那位维吾尔族姑娘说，叶城的石榴太好吃了，我以后要吃遍叶城的石榴。不料她却说，吃满满一盘子拌面不难，要实现满满一肚子誓言不易，叶城的石榴十几种呢，你在叶城待一辈子，有的石榴也未必能吃上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大话了，便赶紧改口纠正了自己的错误。我那时候二十出头，说话容易满嘴跑火车，错了也容易改过来。

叶城是我到新疆后的第一个地方，我们那一批兵从甘肃天水坐火车三天三夜，到了乌鲁木齐后坐飞机到喀什，然后又坐军用大卡车用近一天时间到了叶城。我们本来是西藏阿里的兵，但阿里军分区的后勤保障在叶城，名曰叶城留守处，旁边是阿里地区的办事处，名曰阿办，是我们那批兵经常游逛的地方。就是那样一个地方，我后来才知道是得天独厚的石榴生长地，背后的喀喇昆仑山雪水流下来，与塔克拉玛干的气候融合，形成最适合石榴生长的气候。叶城的石榴个儿大，籽肥，汁多，味美，品种也十分丰富：有颜色红似火，个头硕大的酸石榴；有底色橘黄，阳面带红晕的甜石榴；还有水红石榴、达那克石榴等十多个品种。

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石榴是两千多年前，张骞从安石国带到西域的，当时的西域人一试栽便让它们扎下了根，并且在西域大受欢迎。石榴又名若榴、丹若、沃丹、金罂和天浆，维吾尔语中称“阿娜尔”。因维吾尔族人十分喜爱石榴，很多维吾尔少女的名字都叫“阿娜尔古丽”（石榴花）、“阿娜尔汗”。在叶城的巴扎上喊一声“阿娜尔古丽”，或者言语中提到与石榴有关的“阿娜尔”，就会有不少年轻漂亮的少女或下意识地回头，或本能地应声。不用问，她们都叫“阿娜尔古丽”或者“阿娜尔汗”。

石榴不但好吃，开出的花朵也颇为鲜丽。每年5月，石榴树便绽开出巴掌大的花朵，远看一片红彤彤，凑近还能闻到香味。维吾尔族人对石榴花格外青睐，在毡子、毯子、头巾、衣服和建筑图案上都有不同形状的石榴花。石榴花的花期比较长，前后可持续很多天，直至长出石榴，还在果实前端挂着花蒂，一直到石榴成熟后还留有一截。所以说，石榴是保留花朵最长久的果实。

在那位维吾尔族姑娘的摊位上吃过甜石榴和酸石榴后，我又亲密接触了一次石榴。一天，我们汽车连的连长借了一辆吉普车去买石榴，让我跟去打下手。我们开车到了一户叫买买提的维吾尔族人家，买买提把手一挥让连长和我直接去他家的石榴园，他的老婆和儿子在里面，他们会陪我们摘石榴，摘多少随我们的便，完了找他交钱。听买买提那无所谓的口气，我觉得他是既严肃又幽默，像玩一样就轻轻松松把生意做了。

进了石榴园，好家伙，一树一树的石榴红彤彤的直晃眼，让人觉得每个石榴都已经成熟，风一吹就能掉下来。不料买买提的老婆说石榴即便红透了，能等最好再等些天，那时候摘下的石榴才好吃。为了强调她的话有道理，她又说石榴要紧的地方不是外面的皮有多么红，而是里面的籽儿要红透熟透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她把我们领到几棵石榴树前说，这几棵石榴的里面和外面都长好了，你们随便摘。

我和连长便开始摘石榴。我以为长得好看、色泽透亮的石榴是好石榴，便专拣那样的石榴摘。买买提十多岁的儿子在一边看着我，一边皱眉做出怪表情，我不理他，他便对我说，你以前没见过石榴，没吃过石榴，不认识石榴吗？我被他弄烦了便还是不理他，他便摆手示意我不要再摘了。这时候连长过来纠正了我的错误，原来那些长得不好看，而且裂缝了的丑石榴才是最好吃的。我想再摘几个丑石榴，但箱子已满，只好作罢。

我们抬着箱子离开石榴园时，买买提的儿子在我们后面说，你们的个子和年龄比我大，但是脑袋里装的东西不如我多。我心想小家伙真是话多，但在了解石榴方面他绝对是老师，我便无法停下搬箱子的脚步与他理论几句。

我们返回的车子没开出多远就栽进了路边的沟中，连长急得不停地用手摸秃顶的脑门，却还是无法把车开到路上。汽车连的连长把车开进了沟里，这事可不能让连里的人知道。正当我们着急时，买买提的儿子发现了我们的困境，叫来村里的一帮小孩，他们一起帮我们推车，但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车推动了一点点，离马路还远呢！买买提的儿子站到一块石头上指挥那帮小孩，他们齐心协力把车一点一点推上了马路。然后，他们一起唱着歌走了。连长对他们道了一声谢，买买提的儿子头也不回地说，不用谢，你们来买我们家的石榴，如果不让你们把石榴拉走，倒在了沟里，我爸爸怎么好意思收你们的钱。连长感叹一声，买买提卖石榴变成了人精，他的儿子也快了，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又是一个买买提。

我们部队旁边的“阿里办事处”住了不少维吾尔族人家，我对阿里办事处始终不解，起初认为既然是西藏阿里的办事处，一定会住有藏族人，后来才知道分布于阿里办事处的都是新藏线上的公路段、运输队及地质队的家属院。在公路段家属院，我见到了一户维吾尔族人家吃石榴的情景，他们盛了一盆水，将石榴放进去清洗一番，然后捞出晾晒，等干了后用“皮夹克”（小刀）切成莲花瓣状，每人拿一瓣慢慢拨下石榴籽吃。大多数人吃石榴是将石榴籽掰下来吃，但这家人的吃法却表现出庄重、严肃和清洁，让我在一旁看着肃然起敬。吃完石榴，我以为剩下的石榴皮已没什么用处，但他们却将其收起放在了一边。我细问之下才知道，他们要把石榴皮留给羊吃。人吃石榴籽，羊吃石榴皮，可谓物尽其用。

后来，我调到驻疏勒县的南疆军区，一天和同事安江去喀什买石榴，不料在询问石榴价格时被一伙无赖缠上，非要我们买他们的石榴不可。安江挽起袖子叽叽咕咕说了一番什么，那几个无赖灰溜溜地退到了一边。事后我才知道他报出了在喀什有头脸的一位人物的名字，吓住了那帮无赖。

我们俩穿街过巷进入一户维吾尔人家，他们将石榴保存在地窖中，取出时表皮还湿漉漉的。主人切开一个石榴让我和安江品尝，那石榴籽一入口便有一股清凉甘甜的味道，咬碎后则更甜，加之有一股淡淡的酸味，可谓是味道醇美，口感舒适。我们买了5箱装上车，主人说我们忙了半天，天又这么热，喝一碗茶再走。等茶上来才发现是砖茶，汤色深厚，味道清冽，喝一口便使舌津蠕动，体验到了难得的感觉。主人说当时的新疆还有专门制造那种砖茶的茶厂，据他所知，南疆人大多都喝那种茶，换了别的茶反而不习惯。

就在我们喝茶的间隙，我看见院子一角有一棵石榴树，上面挂着几个红彤彤的石榴，便问主人那棵树上的石榴什么时候可以吃。他笑了笑说，能吃的石榴多得很，但长在院子里专门用于观赏的石榴却不多，吃它们干什么呢？留着，多观赏一段时间。我们便聊起在院子里栽石榴树的事情，主人亦说起这棵石榴树的来历。有一年他在地里栽石榴树，把看上去干枯或有折痕、断裂、无根的树苗挑出来，拿回家准备当柴禾。不料几天后发现其中一根冒出了绿芽，他便将它栽在院子一角，当年就长出硕大的叶片并开出了花，4年后就结出了石榴。主人笑着说，它是自己找到我们家的，我不能让它白来一趟，就让它常年在这里像开花一样陪着我们，多好！

我们聊了一会儿便离去。我走到大门口时回过头，想再看一眼那棵树上的石榴，不料脚下一滑，手里的石榴掉到了地上。这时主人隔着大门喊出一句像谚语一样的话：手里有石榴的人，心里一定很甜。我一愣，感谢地捡起石榴离去。